

沈阳文史资料

第十六辑

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89.5

目 录

建国四十周年专题

张庆泰同志回忆解放战争时期土改和互助合作

- 的情况 李洪钧 张德良 邢安臣整理 (1)
战斗在敌人后方 程序 (9)
沈阳政协四十年 学习文史办 (13)
回忆刘澜波同志 李澄 (45)
回忆张学思将军艾岛之行 徐维 (54)
在文化战线上
——忆1945前后的沈阳 郑文 (64)
公安战线上的风云 王景山 (79)
“功臣号”沈阳从军记 高克 庞乃琪 (87)
举旗转战鄂豫皖挥师长征到陕甘
张竭诚 鲁邦进整理 (93)
难忘的岁月 刘百恒 鲁邦进整理 (111)

古 城 旧 轶

- 古城沈阳的建始与沿革 袁铁风 (122)
沈阳古城的旧貌概况 郭景珊 (130)
历史上的沈阳八景述略 刘振操 (135)
沈阳旧曲艺界的概况 郭景珊 曾昭润 (139)
晚清沈阳三才子 刘振操 (142)
老龙口烧锅和万龙泉的由来 李志 (149)
沈阳造币厂旧管理制度 刘世荣 (152)

港 台 来 稿

- 《雪泥杂记》——剑慧八秩回忆 章剑慧 (168)
我的抗战活动 关世杰 高士振整理 (187)

张庆泰同志回忆解放战争时期 土改和互助合作的情况

1946年6月中旬，我们晋察冀200多名同志从张家口出发，乘往东北运送棉布的汽车，经过内蒙的辽阔地域和辽宁、吉林西部地区，于6月末到达哈尔滨。适逢东北局动员大批干部下乡，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我被派到松江省延寿县的新立区担任工作队长。

(一)

新立区位于延寿县城北，是延寿与宾县、方正县交界的三角地带，曾是抗日联军活动的一个据点。抗战胜利后，东北好多地区一时处于无政府状态，土匪蜂起并与国民党相勾结，与我为敌。当时延寿县境内土匪也不少，我们这个区的一个边缘村庄桃园村，也有国民党地下军活动，头目是伪满的小官吏、地主。他们污蔑共产党怎么怎么坏，吹捧国民党如何好，一部分群众受欺骗跟着他们上了山。他们借着当时的青纱帐，四出活动，抢劫老百姓的牛、马和其他财物，危害地方，破坏土改。还有些汉奸和恶霸，也继续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当时群众对我们还不够了解，对我们能不能站得住脚，还有怀疑。

我们工作队起初就四个人，除我而外，还有一个副队长，两个工作队员。加上原来区里的干部，也不过十来个人。我们当时的工作任务是：发动群众，反霸剿匪，开展土地改革，动员参军参战，支援前线。这几项任务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

的。土改当然是中心，但如不反霸剿匪，恶霸、地头蛇搬不倒，地方不安宁，土改也搞不了，扩兵也没人来。工作从哪里着手呢？访贫问苦，就地宣传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还必须办一些具体的有影响的事情，让群众了解我们，相信我们是给他们办事的。

我们到那里不久，群众就向我们反映：一个伪满警察，霸占了一个贫农的老婆。那个贫农没有办法，收了他几个钱，就算把老婆卖给他了。这个家伙还干了一些别的坏事，群众对他很愤恨。我们就抓住这件事，开会批判斗争他。因这家伙民愤大，当场被打死了。对被他霸占的那个女人怎么处理呢？有的说：归还原主，还给那个贫农。可他本人起初还不敢要，说已收人家的钱了，不能要了。我们启发他的觉悟，问他当初是被迫的还是甘心情愿卖老婆的。这下子触到他的伤心处，当场哇哇地哭起来了。问那女人，也表示愿意跟他过日子。大家看他把老婆找了回来，又有了家，都高兴的不得了。

另一个村子的一个老实农民，老婆被一个在方正县城开饭馆的人弄去了。那个开饭馆的也不是好东西，伪满时与日伪有些勾搭。我们通过与方正县联系，也帮他把老婆要了回来。

东北农村里，穷人娶个老婆不容易，一辈子打光棍的多得很。穷人家即使娶了老婆，如果长得好一点，常被地主、恶棍霸占了去，有冤无处伸，甚至自己性命也难保。我们办了这么两件事，影响可大了，在群众的眼里，我们简直成了包青天。这样，群众就更相信我们是真正给他们办事的。

(二)

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我们随时吸收进步的知识分子和觉悟高的贫雇农参加工作，扩大工作队。到1946年底，我们工作队已扩大到三、四十人。群众积极分子队伍也逐步形成、壮大了。与此同时，为了给主力部队补充兵源。我们不断动员参

军。随着群众发动的深入，参军的越来越踊跃。我们把新兵编成班、排、连，进行初步的训练，给他们讲当前的形势，讲当兵打老蒋、保卫胜利果实的道理；军事方面我们进行了初步训练，够一个连就转交省军区。当时我们是不断动员新兵，不断进行训练，不断向上输送。半年内，向上转送了两个连队。

我们虽然不断动员新兵，但是，区武装还是很有限的，土匪活动仍很猖狂。一会儿谣传土匪进攻我们工作队，一会儿谣传土匪要包围县城，紧张得很。那个桃园村，我们明知道有国民党地下军活动。我们没有马上去收，先是做了些调查，做了些分化瓦解的工作。好人，基本群众还是多数，让他们上山去宣传、动员他们的亲属下山来。到了秋天，高粱已经割倒，我们对那里的情况也大体了解清楚了。哪些是领头的，哪些是胁从的，谁有罪恶，谁没有罪恶以及他们的亲属关系等等，也都有了数，知道他们并没有多大力量。有一天，我们带着一连新兵，突然把那村子包围起来，村前村后都布了岗哨，只许进，不许出。把全村的人集中到一个地主大院里（全村只七、八十户人家），让他们随便坐着或蹲着，我们的战士挎着短枪，坐在窗台上，气氛很严肃。我们讲话，宣传形势，讲土改的道理，土改的政策，同时也联系这个村的情况点了些问题，并号召参加了地下军的主动坦白交代。我们又点他几句：你们谁家的后院藏着牛、马，我们都清楚的……。这样，有人起来坦白了：“我有个亲戚，参加了地下军，他牵来一匹马，拴在我家后院。”接着又有人交代：“×××弄来一条牛，让我喂养，他从哪整来的，我不知道。”还有的交代，谁有几条被子放在他家里。有的交代他给土匪跑过腿，他有个亲戚怎样怎样。不一会儿交代出不少赃物。我们让把这些东西交给农会筹备小组处理，对一般的问题不予追究。但那几个有罪恶的还是不交代。这时，我们带去的了解情况的群众告诉我们：某某是地下军副官，我们只好对这位副官施加了点压力，他还是不说。我们就点他的名，当场把他

捆起来。这样，其余几个也就坦白交代了。记得我们抓了两、三个带回区里。有个头目姓温，还有个叫马守发。马守发家是地主，开烧锅，他带队上的山，以后他投降又带队下山了。我们当时考虑。他已投降，拟予宽大处理。后来听说在形势紧张的时候把他杀掉了。

反霸剿匪的胜利，进一步把群众发动起来了。我们在初步调查的基础上研究划阶级成分。谁是地主，谁是富农，谁是贫雇农、谁是中农，具体划分起来很复杂，需要反复讨论，弄得不好，就出偏差。1946年10月，县委又把长发区交给我们工作队负责。长发区与新立区紧挨着。我们新立区干的事，他们都知道，对那里的情况，我们也知道一些。所以发动起来比较快。我们到长发区后，经过短时间的了解，开了个万人大会，宣传土改政策，批判斗争了几个恶霸地主和地下军头目。有两个民愤较大的，当场就被打死了。1946年12月，我调到东北行政委员会办公厅工作，我离去的时候，新立区、长发区已开始酝酿分地了。

(三)

1947年，农村又掀起一个高潮。在呼兰县出现了一阵“扫院子”风。“扫院子”先是在农村扫，让地主、富农扫地出门。起初是本村扫，而后是村与村互相扫，这就把一些富裕中农和中农也扫了。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枫同志让我去看看。我到那里一看，大街上贫雇农队伍一队又一队，也不管你地主不地主，看到门面比较大点的，房子较好点的，差不多都扫起来。摊煎饼的、炸油条的，也有些被扫了。妇女带的首饰、耳环子、银钗子，也有些扫去了。这个村的贫雇农队扫过了，那个村的贫雇农队还来扫。

这个“扫院子”是土改中“左”倾的一个突出表现，不仅严重侵犯了城市工商业，也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中农利

益，把人们的思想也搞乱了，党的政策被扔到一边，省委的威信也受到影响。当然这样大撒手，放任自流，很快就纠正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情况是比较复杂的，主要还在于领导。大约是1947年春天，有的地区讨论放手发动群众，掌握政策等问题，提出了“大胆放手，就是政策”的口号。这实际上就是没有政策，就是不讲政策，大撒手，群众愿意怎干就怎干，“贫雇农说了算”。毛主席讲要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那是要求各级领导深入群众，走群众路线，集中群众的正确意见，然后再拿到群众中去实践，去检验，而决不是群众要怎干就怎干。群众发动起来以后，更需要好好地引导，决不能放任自流。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个别地区把敌情估计过头了。当时有人一开口就是伪满汉奸多少，敌伪势力怎样强大。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了，对我们自己的力量估计过低了，对群众的觉悟也估计不足。所以，总以为对敌人狠一点好，其实往往把打击面弄宽了，打击了不应该打击的人。那时有的地方似乎是“左”的东西吃得开，受表扬。

(四)

右的倾向有没有？也有。例如，高岗对土改后北满出现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的大肆批判，就是右倾的错误。

北满许多地区地多人少，有的地方平均每人可分几十亩耕地。土改后，有不少农户、农具残缺不全，车马不配套，种地很困难。早在1947年，龙江、嫩江地区就出现了合伙种地的互助合作组织，随后进而出现了类似初级农业合作社的组织。这种合作社当时肇源县较多，叫“四四二合作社。”为什么叫“四四二合作社”呢？就是它在组织互助合作时，规定按股分成，劳力股占四成，车马股占四成，土地股占两成。这种合作

社，完全是农民自愿结合组织起来的，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本应积极引导、提倡，可当时就是不允许它存在。1948年11月，高岗主持搞的一个关于农业问题的决议中。把这种互助合作组织，批判为“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要求各地一律予以解散。

1949年1月，我调到东北农林部工作，听到许多同志对东北局的这个决议有不同意见。不久，我去肇源县四合屯，想实地作点调查。那里有个王振堂，组织了二十多户搞生产合作，他当组长。搞了一年多，买了好几匹马，还开垦了上百亩荒地。组员收入也大大地增加了，个个高高兴兴，我看了很受感动，觉得要解散他们是没有道理的。

1950年春，东北局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关于农业合作社那场争论又被重新提了起来。高岗仍然顽固坚持“必须反对各种各样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

杜者蘅、魏震五等同志回到农村部继续在小组会上展开讨论。林枫同志总是耐心倾听同志们的发言，他只是偶然提出启发式的问题。例如，究竟什么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呢？然后告诉大家，最早提出批判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是毛泽东同志。1948年4月初，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的讲话中说：“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应当批判这种思想”。

经过这次辩论，我们开始理解所谓空想农业社会主义乃是是指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以为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过去历史上代表小生产者的原始社会主义的空想家或实行家，例如帝俄时代的民粹派和中国的太平天国的人们，大都抱有这一类思想。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抱有平均主义思想的人就是在主观上梦想超越反封建的界限，进而要把矛头

指向中农和新式富农，直至指向工商业者，这样就必然要打击广大工农生产者的积极性，必然要使社会生产力下降以至遭到破坏。

农林部小组同志们经过反复争论，深感：“四四二”合作社这种群众创造的新形式，就其本质而言，与那种所谓空想农业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点。这种群众的创举，体现了自愿互利，按劳分配的原则，它绝不是出自某些干部个人的平均主义思想，随心所欲的产物，它是反映土改后特定历史条件下，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五）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以草案形式发给各级党委试行。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决议，总结各地经验，明确地肯定了“在土地私有基础上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且深刻地指出，“一般地说来，互助合作运动是在具体的曲折的道路上前进着的。不同群众的条件和经验如何，企图用一种抽象的公式去机械地硬套，当然是错误，是有损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的。”决议肯定了在土地私有基础上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同时明确指出：“这种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形式”。并且着重指出，这种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形式是有生命力的，有前途的形式。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如果不搞清什么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什么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就不能划清两者的界限，也不能正确地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因此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就仍然可能陷入盲目性而迷失方向。历史是无情的，在农业合作化后期，匆忙并大社，匆忙成立人民公社，搞“一大二公”，搞“一平二调”、“刮共产风”、“吃大锅饭”，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当时谁曾清醒地认识空想农业社会主义的幽灵开始徘徊

在祖国大地呢！只有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冲破了禁区，解放了思想，我们的农村社会主义又经过若干曲折的道路，这才真正逐步得到从空想到科学的健康发展。

（此文是根据1980年1月10日张庆泰同志谈话记录整理。
记录整理者：辽大历史系中国现代史研究室东北解放战争史研究组李洪钧、张德良、邢安臣）

战斗在敌人后方

——沈铁抗三年游击战散记

程 序

1945年8月，我从延安来到沈阳。不久，我东北主力部队根据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思想，北上去开辟西满、东满、北满根据地。还有一部分部队在沈阳等大中城市周围的农村，开展游击战争，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我奉省委和沈阳市委的指示也留下来工作，曾先后担任中共沈阳市工委民运部长兼沈阳、铁岭、抚顺（包括开原、清原县一部）联合县委书记，独立二团政委，参加了这一地区持续三年的敌后游击战争。

锦 奸 删 隐

日寇投降后，伪满的汉奸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地下先遣军。这些人和当地的恶霸地主、土匪勾结在一起，建立了许多反动武装。在沈阳北郊活动比较猖獗的有“东大会”、“西大会”两个反动武装组织。他们利用我军初到东北，地理民情不熟，到处烧杀抢夺，抽兵抽枪，逼租收税。欺压群众，闹得方圆百里鸡犬不宁，老百姓把他们都恨透了。当时，沈阳还在我们手里，从北满运来的粮食、猪肉、煤炭等，经常被他们抢劫一空。我们派出去的工作队和工人自卫队，也常遭到他们的伏击，有的同志甚至被活埋了。这使我们更加看清，不彻底打垮反动武装，我们就不能在广大农村立住脚，扎下根。

一次，戴昊、丁贤两同志带领100多人的工人自卫队到蒲河

一带开辟工作，被“东大会”、“西大会”2000多人围困在一家姓吴的地主的大院里，整整围了三天三夜。省委和市委得到这个紧急情况后，立即派我率领一批地方干部，配合保三旅和三五九旅一部，前后夹击，把反动武装打散了。我们又乘胜追击，直捣这股反动武装的老巢。在蒲河、古城子一带将他们团团围住。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在我军猛烈的炮火攻击下，敌人被迫龟缩在村子里，冲又冲不出来，退又退不出去，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发动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迫使大批受蒙蔽参加反动武装的人自动放下武器。剩下的顽敌拼死抵抗，被我军全歼。

蒲河、古城子一役，“东大会”、“西大会”土崩瓦解，整个沈北地区被我军所掌握。为了扩大战果，我们深入沈阳、铁岭、抚顺等地农村，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开展锄汉奸、剿土匪斗争，开仓济贫，减租减息，建立民主政权，很快在这一地区站住了脚。

蔡台诱敌

国民党占领沈阳以后，我们独立二团和各区中队分散在沈阳附近农村开展游击活动。国民党为了向北推进，在沈北铁路沿线部署了很多的兵力，在农村建立了伪政权，监视我军的行踪。我们在这一带活动受到了很大限制。部队一行动，伪保长就报告，敌人便从后边跟上来，追得我们吃不上饭，睡不好觉，经常是饭没做熟就撤退。为了牵制敌人的主力北进，同时给伪保长一点厉害看看，我们想出了一个借刀杀敌之计。

一天晚上，我们一连人悄悄来到蔡台子，大部分人留在村外隐蔽起来，小部分人进了村子。我把伪保长找来交给他一些钱，对他说：“今晚我们要在这儿住下，给我们预备饭，杀口猪。”并警告他“不许走漏风声”。其实我们早已掌握这个伪保长的情况，他经常给敌人送情报，很得国民党的信任。

当我们吃完饭刚刚躺下睡觉，伪保长就偷偷溜出村，直奔虎石台车站。伪保长一走，我们知道敌人上钩了，立即把队伍集中起来，拉到事先选择好的有利地形。果然不出我们所料，驻在车站的二〇七师一个连的敌人，天刚亮就出来了。虎石台车站距离蔡台子只有十来里，中间隔着百米宽的蒲河。我们的队伍就埋伏在蒲河一侧，等着敌人自投罗网。

敌人开始过河了，连哗啦哗啦的趟水声都听得清清楚楚。战士们屏住气，耐心地等待着。当敌人走到河中间，我一声令下：“打”！机关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响起来，河水四溅。打得敌人人仰马翻，走在前边的敌人还不知怎么回事就倒在河里了。后边的敌人如大梦初醒，扭头就往回跑，还没上岸就被我军密集的火力打死在河里。剩下的敌人逃上岸，没命地往车站跑。战斗只进行了十来分钟，歼敌70多人，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

夜袭鸡冠山

1946年的严冬来得比往年早，刚进11月就下起了大雪，气温降到零下20多度。可是，我们的部队在山里还穿着单衣，不少战士手脚冻伤了。

要坚持斗争，当务之急是解决过冬棉衣。上哪去要呢？远离主力部队，又失去了联系，只有靠自己来解决了。我们侦察到，铁岭的鸡冠山附近是敌军的物资集散地，那里有上千套日本鬼子投降时留下的军装。团党委决定：打下鸡冠山，夺得棉衣穿。

一天晚上，我们独立二团集中了500多名干部、战士，从滚马岭出发，直奔鸡冠山。

鸡冠山是个小镇，有三四百户人家，三面环山，一面是通往铁岭的公路。镇子里驻着国民党交通警察总队的一个大队，山上遍设岗哨，防守很严。我们决定先占领周围山头，然后袭击敌人队部。派出去的侦察员很快押着两个敌哨兵回来了，根据

敌人交代的情况，我们分四路包抄过去，迅速摸到了敌人身边。战斗打响后，镇子周围的敌人还没爬出被窝就举手投降了。镇中的敌人让枪声惊醒，慌慌张张胡乱放了一阵枪就四处逃跑了。我们这一仗是速战速决，消灭了大部敌人后，立即打开库房，搬运日伪军用皮大衣和弹药。皮大衣堆积如山，战士每人都穿上一套，剩下的用马驮着。天刚刚放亮，我们就满载着胜利成果返回驻地。

这场袭击战结束后，我们独立二团受到了辽东军区的通电嘉奖。

岱海寨突围

三年游击战争，我们大部分时间在深山荒村里度过。战斗很频，生活很苦，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没有住的，还常常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但是，我们这支部队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中，得到了群众的信赖和帮助。没有粮食，群众吃野菜，把省下来的一点粮食送给我们；没有鞋穿，也要把鞋送给子弟兵。在我们遭受敌人包围的危险时刻，是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们突围脱险。

记得有一次，我带着4个人来到铁岭和抚顺两县交界的岱海寨，正在召集当地干部开会的时候，国民党300多人从上哈达、下哈达开过来。在山上打柴的一名群众一看来这么多国民党军队，急忙跑回村报告。当我们一出村子，枪声大作，敌人从四面围了上来。我一看情况危急，当机立断，夺路而走，冲上北山。敌人疯狂地追来，眼看就要冲到山顶了，我们5条枪一齐开火，手榴弹也齐向敌人甩去。在一片爆炸声中，我们纵身滚下山岗，突出重围。

1948年11月，我们在经历了三年游击战争后，伴随着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攻克沈阳的进军号，回到了这座获得新生的大城市。

沈阳政协四十年

学习文史办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沈阳市委员会（简称“市政协”）成立于1949年11月，是我国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地方组织。它的发展历史经历了两个时期。从1949年11月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简称“市人民协商委员会”）成立到1955年6月市政协诞生，是第一个时期。1955年6月7日，市第三届协商委员会根据1954年1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公布的章程，召开扩大会议，组成了市政协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并于同年6月11日至15日召开的市政协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正式成立了政协沈阳市委员会，从此市政协便进入了历史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后一时期又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55年到1967年，市政协举行过六届全体委员会议（简称“全会”）对调动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对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等做出了很大贡献，不过，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工作也有严重失误。

第二阶段，从1967年到1975年，政协工作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停止了活动。

第三阶段，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沈阳市的统一战线工作进入了建国以来最活跃阶段。市政协对全市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

四十年来，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随着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中心工作的转变，政协组织的地位、任务、作用发生了相应的深刻变化。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市政协作为坚持、完善、丰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织形式，在地方重大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它的发展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取得的进展、成就和尚存的问题。虽然市政协在四十年中走了一段曲折的道路，但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在中共沈阳市委的领导下，还是不断发展壮大。1955年第一届委员会时只有委员94人，到1989年第九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委员已达502人，专门委员会已发展到七个。市政协机关的机构也由单一的秘书处发展为一厅、六个局级建制的办公室。机关工作人员也由最初的4人发展到85人。今天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对今后加强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将是非常有益的。

人民协商委员会的活动

1949年11月24日，遵照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颁布的《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召开了沈阳市第一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协商委员会。第一届协商委员会由19名委员组成。市委书记黄歇东任主席，市长朱其文、副市长焦若愚任副主席，民政局长高曙晖任秘书长。协商委员会的秘书处设在市政府民政局，有4名工作人员，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第二届协商委员会于1950年7月3日召开，由33

名委员组成，主席朱其文，副主席焦若愚、卢广绩。第三届协商委员会于1953年2月1日召开，由45名委员组成，主席焦若愚，副主席张力克、邵凯、朱维仁、巩天民。这三届协商委员会作为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期间的常设机构，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同时也作为地方政协组织发挥作用，协商讨论全市性的重大问题。在沈阳市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民主改革、“三反”、“五反”、“禁毒”、“肃反”等重大斗争中，积极开展协商讨论，审议、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法令，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协助政府开展工作，有力地促进了沈阳市各项事业的发展。如1949年11月30日的一届一次会议上修改了关于劳资关系的三个条例，通过了处理劳资关系的暂行办法。1950年9月23日的二届二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了工厂安全暂行条例，讨论了公私企业加工订货暂行管理办法和加工委员会组织条例。1952年2月15日，讨论通过了“五反”运动中的六项紧急措施，在全市形成了一个广泛的群众性运动，狠狠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违法活动。保证了“三反”、“五反”运动的健康发展。协商委员会议除了讨论、审议推行有关的地方法规和政策外，还协助市政府动员、组织全市人民广泛参加重大的政治活动。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并侵略我国领土台湾。市协商委员会分别于同年7月、次年6月，发起了全市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签名运动和捐献飞机大炮运动，截至1952年初，全市人民捐献战斗机38架。在1951年镇压反革命和1952年“三、五反”运动中，市协商委员会与市政府委员会先后举行过4次联席会议，协商通过了在全市镇压反革命及反击不法资本家猖狂进攻的具体措施，并进行了广泛宣传。1952年2月又协同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沈阳市分会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中国人民反对使用原子弹武器签名运动委员会的号召，积极组织全市人民开展反对使用原子弹武器的签名运动，签名人数约达205万名。在